

守望者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一力馆 董建中-主编



Ruling from Horseback

# 马上治天下

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 安熙龙-著

(Robert B. Oxnam)

陈晨-译 董建中-审校

守望者  
The Detacher



---

Ruling from Horseback

---

鳌拜辅政时期的  
满人政治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

[美] 安熙龙 (Robert B. Oxnam) - 著

陈晨 - 译 董建中 - 审校

---

海外中国研究文萃·二力馆

董建中·主编

# 马上治天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美) 安熙龙 (Robert B. Oxnam) 著；陈晨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一力馆)  
ISBN 978-7-300-27268-9

I. ①马… II. ①安…②陈…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3472 号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一力馆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 (1661—1669)

[美] 安熙龙 (Robert B. Oxnam) 著

陈晨译

董建中 审校

Mashang Zhi Tianxia: Aobai Fuzheng Shiqi de Manren Zhengzhi  
(1661—1669)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148mm×210mm 32开本	版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张	10.375 插页2	印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4 000	定价	6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索尼画像

复制得到了日本芦屋市大卫·基德 (David Kidd) 的许可，出自他的收藏品。画像的外衬标签上写有：“辅政大臣索。五十五岁。水獭皮边领袖朝服。顺治十二年奉上钦赐。”参见大卫·基德：《宫廷肖像画中的礼仪与写实主义》[“Ritual and Realism in Palace Portraiture,” *Oriental Art* 19, no. 4 (Winter 1973): 421-428]。

献给我的妻子芭芭拉

## 致 谢

我要深深感谢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教授，他启发我写作此书，对我的研究与写作给予了高明的指导。我深深获益于史景迁教授对清初历史的洞见及处理原始资料的方法。

我还是耶鲁大学硕士研究生时，已故的芮玛丽 (Mary Wright) 教授在生活上和学术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许多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深深受益于她的才能和照顾，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在她指导下学习的人何其有幸，定会怀念她独一无二的温暖与学术的高标准、严要求。

柯白 (Robert Kapp) 对书稿一丝不苟的评论，使我受益良多，他的许多意见已融入本书。我还要感谢唐纳德·普赖斯 (Donald Price)、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安德鲁·贾 (Andrew Chia)、乔治·库珀 (George Cooper)、道格拉斯·佩恩 (Douglas Payne)、维拉·莫里西 (Vera Morrissey) 阅读书稿并提出宝贵建议。在查找相关著作时，我得到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万惟英 (Wan Wei-

ying) 专业的、源源不断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莫大帮助，他们指导我利用与东亚历史资料相关的丰富馆藏。我特别感谢的两个人是耶鲁大学远东语言研究所的黄伯飞 (Parker Huang)、三一学院的松见清 (Kiyoshi Matsumi)，他们在我翻译清初的一些档案时提供了极有用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几位研究清初历史的专家，特别是卫思韩 (John Wills)、小约翰·瓦特 (Jr., John Watt)、劳伦斯·凯斯勒 (Lawrence Kessler)、大卫·法夸尔 (David Farquhar)、吴秀良 (Silas Wu)，他们就征引文献给出了重要建议。

感谢耶鲁大学历史系、远东语言研究所及东亚研究研讨班中所有帮助我学习的人。书中所做的大量研究及部分写作，在我就读于耶鲁大学历史系并撰写以《鳌拜辅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1661—1669）》（“Policies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为题的论文时业已完成。三一学院为此项研究的开展及本书书稿的录入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支持。帕特里夏·麦克唐纳 (Patricia McDonald)、卡罗尔·斯坦曼 (Carol Steiman) 二人出色地完成了书稿的录入工作。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妻子芭芭拉 (Barbara)，她虽忙于研究生学业，但仍然拿出大量时间对本书的行文及结构提出了许多意见。

安熙龙 (Robert B. Oxnam)

三一学院

哈特福特，康涅狄格州

致谢……1

第一章 | 绪论……1

第二章 | 辅政起源（一）：1580—1643……18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19

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满洲四臣……32

第三章 | 辅政起源（二）：1643—1661……46

逆境中的政治教育（1643—1650）……47

一场光荣的介入（1651—1653）……58

一位汉化者的满洲遗产（1653—1661）……61

辅政统治的建立：1661年2月……75

第四章 | 辅政统治与京师官僚体制……78

满人的德治：1661年初……80

京师政府机构（1661—1666）：满洲机构……81

京师政府机构（1661—1666）：传统的官僚机构……93

为满人所用的汉人制度：考课制度与科举制度……99

第五章 | 整拜辅政与地方治理……109

整拜辅政与地方官僚政治：寻找忠臣……111

整拜辅政与地方精英：极端专制……122

整拜辅政时期地方政策中的满洲观念……134

第六章   鳌拜辅政时期的军事政策·····141	
军队结构与武职官场·····142	
鳌拜辅政时期的统一战争·····151	
17世纪60年代的吴三桂及“三藩”·····170	
第七章   鳌拜辅政时期的对外政策·····175	
鳌拜辅政时期对耶稣会士的迫害·····176	
17世纪60年代的朝觐、朝贡关系与中西关系·····181	
鳌拜辅政时期与东北地区·····191	
第八章   党争与鳌拜辅政时期的终结·····200	
四辅臣集团的分裂与鳌拜集团的先兆（1665—1666）·····202	
鳌拜集团的鼎盛时期（1667—1668）·····212	
皇帝集团的出现·····219	
鳌拜集团与索额图—明珠集团：转向权力均势·····231	
鳌拜之死·····236	
第九章   鳌拜辅政与康熙统治·····240	
附录1 顺治皇帝之“死”与遗诏的伪造·····246	
附录2 重要京官的仕宦模式（1661—1666）·····250	
附录3 鳌拜辅政时期地方官的任命与任期·····258	
附录4 鳌拜辅政时期的经济政策·····263	
征引文献·····269	
索引·····287	
译后记·····317	

## 第一章

### 绪论

1661年2月5日晚，二十二岁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宫殿内驾崩了，这位皇帝1643年继位，年号为“顺治”。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帝国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此外，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太皇太后\*孝庄的教诲。

表面上，权力平稳过渡。顺治遗诏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辅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统治者注意皇帝行为中的误区。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汉官定会猜测的那样，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现在认为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公然伪造的（参见附录1）。

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迁怒于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

---

\* 这里“太皇太后”的用法不严谨。实际上作者对“皇太后”“太皇太后”称呼的用法是清楚的，见第三章注⑦。后文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译者

而是亲近汉官，整个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遗诏中的许多内容并非这位将死君主的临终遗言，而是在所谓的鳌拜辅政时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的前兆。在辅政的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这些与他们构建一个首崇满洲的中华帝国的理想相契合。然而，1666年之后，四辅臣之一的鳌拜设法操握权柄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1667—1669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设法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帝于1669年6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鳌拜辅政时期，是以四辅臣中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辅政局面出现于2 清朝（1644—1911）的成长期，在满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时期之前。17世纪时，特别是在鳌拜辅政时期，满洲人在统治汉人的国家与社会时，面临着维护手中权力、保持满洲传统的困境。四辅臣是仅剩的、实际参与1644年入关之前诸多战役的清代统治者。尽管四人将一些行政管理经验带入辅政，但是他们的主要价值观在东北南部和华北战场中已经塑就。四辅臣在辅政之前戎马倥偬三十年，因屡战屡胜而赢得名望，获得奖赏。他们看重的是勇气、效率、服从。他们骄傲地回想起满洲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他们不信任汉族士大夫阶层，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柔弱无力，且对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诚。

然而，四辅臣在17世纪60年代所统治的辽阔帝国，在人口和文化传统上以汉人为主。由几十万人口构成的、数量极少的满洲

人——在汉人看来是“野蛮”的少数人——统治着 1.5 亿汉人。四辅臣也继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员构成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17 世纪 30 年代的皇太极、40 年代的多尔袞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显而易见，四辅臣不得不受汉人的社会政治秩序约束并围绕此进行统治。因此，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与政策，在满洲至上的诉求和强大的汉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几个非汉族王朝皆屈服于此——之间充满紧张关系。在此环境中，汉人，同样还有满洲人，在北京皇帝宝座周围竭力开展着政治活动。

本书根据清初满汉认识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来探究鳌拜辅政时期的历史。本书在评判这一“鳌拜辅政时期”起源时检视了汉化和满洲统治的因素，检视了 17 世纪 60 年代的关键性决定及事件，检视了标志着辅政时期终结与康熙帝崛起的派系冲突。汉化的界定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而满洲统治（Manchu dominance）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这种二分法解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在入关战争和清初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谨慎小心，二分法可继续用以有效地洞察 17 世纪时满洲人涵化（acculturation）进程。然而，痴迷于这些术语——特别是将这一时期视为完全汉化或完全满洲化（Manchu-ized，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会导致严重的曲解。正如在后征服时代中政治权力的易手一样，常常存在着从汉化到满洲统治的变化，而政治人物时常在各种混合体中走向两个极端。当人们开始探究这些混合体，诸如人格特质、抱负、派系与氏族

关系、智慧、政治经验以及个人恩怨等因素时，与满汉取向交织在一起，是以历史学家在带领我们走近真实时，工作变得更复杂了。

了解了上述这些条件，首先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似乎是适当的，以探究此前对于清朝崛起及其发展的一些诠释。必须指出的是，开始时，除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中收录了几篇有价值的传记外，西方历史学家几乎未涉足鳌拜时期。除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孟森、萧一山）对辅政时期做过概述外，鳌拜时期在以任何语言写就的清初历史作品中都是空白。历史学家在诠释辅政时期时虽然有所欠缺，但在清朝编年史实录中却能查找到丰富的史料，原始版本的实录中有 30 卷计 1 700 余页专记鳌拜辅政时期。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人们可以发现有关清廷的逐日记录：地方官和军事将领进呈的奏疏，对这些奏疏的御批及四辅臣对奏疏的意见，四辅臣以康熙帝的名义颁布的上谕、诏书，北京和整个帝国财政、司法进展的大量信息。对实录予以补充的是大量的类书、各种传记、军事组织的史书、各省和各地的方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研究。尽管上述资源基本缺乏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这些在西方历史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材料所具有的随性色彩，但是其优点在于全面和细节。

依靠这些资源，在此前对 17 世纪 60 年代研究匮乏的情形下，为了得到可用的解释，人们不得不深入了解清初的历史书写。本项研究很快会揭示出汉化与满洲统治的争议。汉化研究方法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这种传统观念以汉人中心，其理想化

且精简化的形式通常更适于书写历史而非史实：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即“天下”），因此中国并不是现代语意上的国家，而是世界轴心或“中央之国”（“中国”），其政治、文化影响遍及四方。另外，理想地说来，内地周边的非汉民族及国家，应该是通过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团、向中国的优越性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国家发展情况的方式，来表达对帝国的敬意。“夷”被期望着在中国的影响下保持驯良，皇帝可以采取协商、联姻、赏赐等羁縻政策以怀柔非汉族群体。人们希望这些方法会使蛮夷互相争长，以防它们结成一个能够争夺中国皇位的更大军事、政治联盟。最后，皇帝或许被迫诉诸战争，并因此创置戍边部队以便日常监管，如有需要能迅速做出反应。<sup>①</sup>

当然，这一体制极少是以上述原始简易的方式运行，当缔造新王朝的非汉族征服者统治中国时，这一体制常常被彻底打破。自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至17世纪满洲入关达到顶峰，非汉民族对部分或全部帝国的统治差不多占据着半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因契丹辽朝（947—1125）、女真金朝（1115—1234）、蒙古元朝（1271—1368）和满洲清朝（1644—1911）的存在而远远超过了二分之一。汉人如何解释他们的世界秩序如此频繁地被理应在其约束之下的蛮夷颠覆？答案在汉化理论中找得到。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边疆政策的缺

---

<sup>①</sup> 下列两部著作对这些概念及起源、与帝制中国历史的关联性做了仔细研究：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特别是第1卷第1部分；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脚注中的专著、文章等的出版信息或文献来源信息，请参见书后的“征引文献”，不再一一标注。——译者）

陷使得蛮夷军队倾覆了汉人王朝，但蛮夷统治中国的能力取决于其对汉人政治结构及其儒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采纳。一句中国古话评论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种汉化理论，除了为面临蛮夷统治困境的汉族士大夫带来宽慰外，在非汉族王朝的历史中也有着深厚基础。例如，上述所有王朝最终都大量采用了汉族的政治结构、宫廷礼仪、意识形态，甚至有着语言和文化的追求。

这种汉化解释在 20 世纪的西方汉学中强劲复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梅谷（Franz Michael）已经找到了汉化在进行征服战争之前非汉族入侵者的政府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让我们深入理解了中华帝国北部和西部边疆上的边缘地区，许多入侵即发源于此。这些边缘地区——16、17 世纪的东北南部地区也是拉铁摩尔的众多例证之一——通常是已为征服战争做好准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倘若有强势的领导、汉族谋臣的襄助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复合经济基础，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秩序和军事组织便可产生。总体来说，这就是拉铁摩尔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崛起、满洲国家和军事组织的出现以及 17 世纪中叶满洲入关战争所做出的解释。<sup>②</sup> 这是一种基于部分汉化的解释，即汉人因素和非汉人因素的结合带来了征服的要素。

梅谷在《满洲统治的起源》一书中将拉铁摩尔的一般性理论用于解释满洲的崛起，立场坚定地支持入关战争之前满洲的汉化。这本先驱式的著作于 1942 年出版，时隔三十年，甚至在大量新发

<sup>②</sup>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尤其参见第 5、16、17 章。

现的原始材料出版之后，作者的大部分言论仍是很有用的。梅谷发现了在17世纪30年代的皇太极时期，盛京地区存在的汉化官僚机构，探讨了效力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汉族谋臣所扮演的角色，强调了满洲八旗制度的管理作用，并反思了满洲氏族在入关后的持续斗争，所有这些都是对清初的重要见解。因此，我与梅谷所做解释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这些具体内容，而是在于他对汉族影响力的重要性的过度强调，其结论中有一项明确指出：“正是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思想使满洲得以征服中国。”<sup>③</sup> 我认为这一观点过度强调了入关战争前后满洲的汉化，却忽略了汉化与满洲统治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康熙统治时期。并且，这一观点也淡化了入关战争之前满洲制度的持续重要性、满洲人的政治领导以及满洲人对于自身传统的执着。我在本书第二章至第七章探索鳌拜辅政的渊源即1644年入关战争前后，以及研究辅政时期的关键政策时，这些见解将有所展现。

对满洲入关战争的另一主要解释源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涌现的中国革命分子言辞尖锐的反满作品。反满的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的共同主题。邹容的名作《革命军》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趋势：“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

---

<sup>③</sup> 梅谷：《满洲统治的起源》，第79页。梅谷所强调的以明朝为范本的满洲八旗制度的起源以及早期满洲国家的其他方面，受到有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例如法夸尔的《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梅谷的确在稍后的章节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一般性结论，指出皇太极对金朝先例的依赖，并注意到了满洲人对于被同化的普遍担心，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强调满洲人全部采纳了汉族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梅谷：《满洲统治的起源》，第99~108页）

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sup>④</sup>反满激情不仅在激进分子阶层中传播，而且蔓延到众多改革者，学识丰赡、善于表达的梁启超或许是最好的例证。梁启超印发了数千本王秀楚所著的《扬州十日记》，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满洲军队攻取扬州之时（1645年5月20日至29日）所发生的奸淫掳掠、肆意屠戮的行为。<sup>⑤</sup>满洲人的形象因此被定型、贬低。在许多革命者的眼中，满洲人是国内改革的蛮夷反动派、外交事务的懦弱卖国贼。作为被革命者视作19世纪70纪祸患的替罪羊，满洲人是一个有用的靶子：他们可以被轻易地认定为中国弊端的肇因，并对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各种革命运动起到消极的作用。

除拉铁摩尔、梅谷外，还有几位学者对满洲人的这一形象提出相反看法。芮玛丽指出，18、19世纪出现了“满汉混合体”，19世纪中叶满洲人和汉人联合抗击叛乱和帝国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满洲人中出现了杰出改革者。然而，芮玛丽也认同清末时

<sup>④</sup> 英文译文引自冉孜烁：《早期的中国革命家：1902—1911年沪浙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8页。17世纪明朝遗民运动中的强烈反满宣传在19世纪早期被秘密社会复兴。特别是三合会，在仪式和宣传中尤为依靠反清复明的标语。参见鲍里斯·诺维科夫：《三合会的反满宣传（1800—1860）》，第49～63页。

对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作品中的反满主题，高慕柯已做出了精彩的评论。通过检视同盟会的纲领，特别是汪精卫的著述，高慕柯指出了反满宣传的三个方面：“第一，满洲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他们四处劫掠，任意屠戮，一旦掌权，便实行歧视性政策，将汉人贬降至社会中的下等地位，并将许多其他的压迫性措施加诸汉人身上。第二，满洲人为外来的蛮夷，是低等的民族。第三，满洲人现在伪装成拯救中国的改革者，主要是通过引进宪政，试图以此实行一个巨大的骗局。”（高慕柯：《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69页，也可参见第65～105页）

<sup>⑤</sup> 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26～127页。译文可见英文版的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